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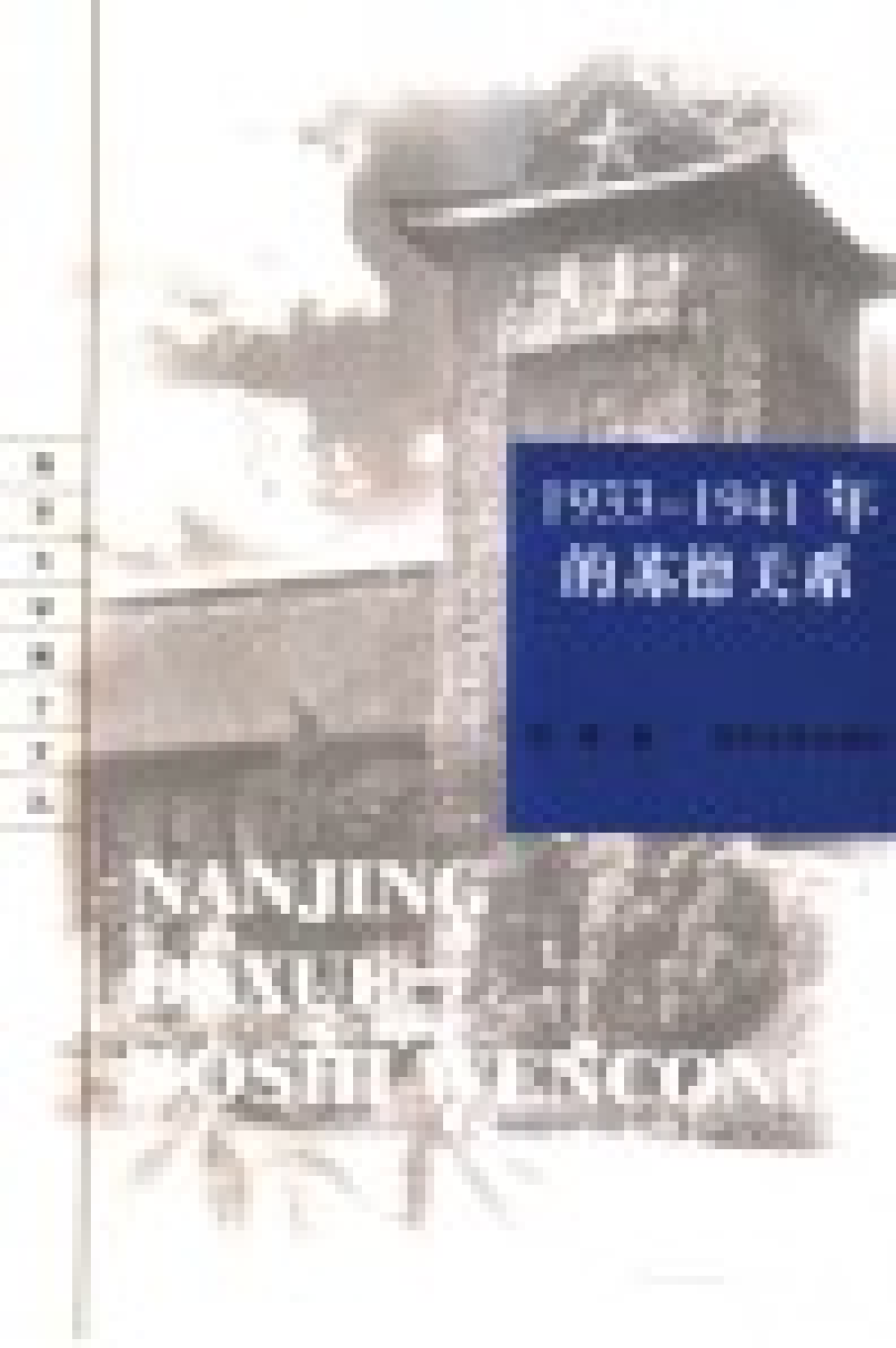
南
京
大
学
博
士
文
丛

1933-1941 年 的苏德关系

陈 晖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
DAXUE
BOSHI WENCONG



1933—1941 年
的暴德无期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NANJING
MASSACRE
WOSTIL BEICONG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1933-1941 年的 苏德关系

陈 晖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3~1941 年的苏德关系/陈晖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ISBN 7-305-04463-6

I. 1. 1... II. 陈... III. 国际关系史-研究-苏联、德国-1933~1941 IV. ①D851.29 ②D8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285 号

从 书 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1933—1941 年的苏德关系
著 者 陈 晖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字数 460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463-6/K·289
定 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
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 蔡文彬
责任校对 吕元明
封面设计 潘小庆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第七辑)

- 生成与解构
——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批判疏论 方向红 著
- 1933-1941 年的苏德关系 陈 晖 著
-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 倪婷婷 著
-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 苗怀明 著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 颖 叶继元

孙义燧 李 成 吕 建

任天石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郭子建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赖永海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

1933—1941 年的苏德关系

规范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前言

1939 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至今已有 60 余年了,由此引发的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初期,特别是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 40 年代初的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和争论却仍然没有停息。从 1933 年至 1941 年短短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转变,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苏德关系在苏联政策的历次转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苏德关系是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尽管其他大国关系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苏德关系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不难发现,苏德关系也是与二战起源有关的重大问题。首先,这个问题直接涉及一战后确立的新的国际体系——凡尔赛体系的架构。苏德两国都受到该体系的压制和排斥,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它们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心怀不满的国家,都有推翻现行国际体系的愿望,地缘政治的利益就构成双方以后合作的基础。其次,在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国际关系中,苏联对外政策的走向决定着维护现状和改变现状两种力量的对比,即法西斯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希特勒尽管有发动世界大战以成就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但他也需要为此创造对德国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在 1939 年所选择的外交方针,则根本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使得希特勒能够以最小的风险发动战争,当然,在讨论战争的责任时不能将苏联和德国等量齐观。

第二,研究冷战的起源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苏联对外

政策。苏联正是借助苏德条约，建立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扩大了其安全地带。虽然苏联错误的外交理念使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在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并没有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反而片面地认为邻国是外敌入侵的跳板，更加强烈地推行建立势力范围的政策，以便强有力地控制周边国家和地区。为此，苏联不但要求西方承认它通过苏德条约所获得的“合法”利益，而且它的某些举动甚至超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要求，这必然加大了西方对苏联意图的怀疑和猜忌，加剧了双方在战后安排问题上的冲突和对抗。因此，苏联对冷战的产生也是难逃其咎的，尽管西方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研究苏联的兴亡史也不可能回避这段历史。毋庸置疑，苏联通过与德国的合作，成为主宰欧洲命运的国家，恢复了一战后失去的大国地位，这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开始。然而，苏联外交同时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因为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遭受苏联的伤害最为严重，它们后来成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导火索，这就不令人惊讶了。我们从苏联外交的历史反思中，应该认识到苏联外交政策内在的危害性，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战前后的苏德关系的变化是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对此史学家众说纷纭，观点大相径庭，加之战后冷战的兴起，更使这一研究蒙上意识形态的色彩。西方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1948 年美国国务院依据缴获的德国外交文件中有关苏德交往的内容，出版了《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其中公布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在战后初期，西方学者就开始出版学术专著，发表研究论文。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史学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的研究环境处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冷战气氛中，其观点难免会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或者服从西方

战略的需要,因而,这些观点带有很浓的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色彩。此外,由于缺少有关的苏联外交文件,他们只能借助于同一时期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外交文件,材料上存在局限性。所以,他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存在主观臆断的味道。

西方学者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以便最终推动世界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罗伯特·C·塔克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设想两个欧洲同盟“发生战争,而苏联保持中立,直到有利时机才介入以推进共产主义事业”。^①第二种观点是,斯大林倾向于通过与德国重建“拉巴洛”式的关系,以确保苏联的安全。美国学者杰哈德·温伯格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为改善苏德关系的试探为例,断定苏联一直在追求德国的友谊,集体安全政策只是第二位的选择。“斯大林相信,大张旗鼓地和西方举行谈判,有可能诱使德国达成协议”。^②第三种观点注重苏联外交政策上两条对立路线的摆动和反映,这种观点认为,李维诺夫代表的是集体安全路线,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为集体安全的反对派。美国学者乔纳桑·哈斯拉姆称后者外交导向为“孤立主义”,斯大林在两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哈斯拉姆认为,由于英法不愿向苏联在欧洲的安全提供切实的保证,所以“俄国人别无选择,只好与德国达成共同管理东欧的协议”。^③第四种观点认为,苏联试图通过和西方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① 罗伯特·C·塔克:《执政的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年》(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 - 1941*, New York, 1990.), 纽约1990年版,第592页。

② 杰哈德·温伯格:《纳粹—苏联条约:半个世纪后的回眸》(Gerhard Weinberg, “The Nazi-Soviet Pact: A Half-century Later”), 美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第68卷,1989年第3期,第184—185页。

③ 乔纳桑·哈斯拉姆:《1933—1939年苏联和为集体安全的斗争》(Jonathan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Struggle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 1933 - 1939*, New York, 1984.), 纽约1984年版,第231页。

只是在与英法谈判失败后,才同德国签约以保证自身的安全。英国学者 A. J. P. 泰勒指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与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建立反纳粹侵略的军事屏障。他认为,克里姆林宫诚实地履行集体安全政策。直到西方不断地予以拒绝后,它在 1939 年才最终偏离这条路线。^① 根据美国学者乔治·F·凯南的看法,由于英法拒绝将缓冲地带交给苏联,斯大林才选择愿意满足其安全需要的希特勒。^②

随着冷战的结束,大批前苏联档案的解密,这个主题又成为国际关系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学者很快便认识到新材料的价值,他们也利用这些文件来进一步研究二战前夕苏德关系的重大问题,开始摆脱过去意识形态的偏见,较为客观地探讨苏联外交政策转变的动机。英国学者杰弗里·罗伯茨相信,斯大林真诚地努力与西方强国达成集体安全的协议,当这证明不可行时,他才转向希特勒。根据他的观点,苏德条约只是划分势力范围,并非为战争打开绿灯或夺取领土的借口,而是苏联对变化的局势所作的机会主义的反应。他认为,“(苏德)条约产生于苏联领导人(主要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他国的行动和倡议做出反应的短期危机处理过程之中”。苏德条约是“一系列战术转变和调整的结果,而非战略算计的结果”。^③ 以色列学者加布里尔·戈罗杰茨基也认为,斯大林“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部分时

① 戈尔登·马尔泰主编:《二战起源的再思考,纪念有关 A. J. P 泰勒的辩论二十五周年》(Gordon Martel (ed), *The Origi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econsidered The A. J. P Taylor debat after twenty-five years*, London, 1986.), 伦敦 1986 年,第 175 页。

② 乔治·F·凯南:《苏联对外政策,1917—1941》(George. F. Kannan,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1941*), 普林斯顿 1960 年版,第 101 页。

③ 杰弗里·罗伯茨:《苏联对纳粹德国条约的决定》(Geoffrey. Roberts, “The Soviet Decision for a Pact with Nazi Germany”)英国《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1992 年第 1 期,第 58 页。

间,为了使俄国不卷入战争,他将集体安全政策一直坚持到 30 年代末,由于此时他不再相信这种政策会取得成功”,所以才同德国签订条约以确保苏联的安全。^①

前苏联时期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苏德条约的研究受到最严格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可以说属于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禁区。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苏联学者阐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必须服从本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官方观点。苏联官方一直矢口否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的存在,认为它是西方伪造的文件。苏联外交部编辑的苏联外交文件集,均没有收入涉及苏德关系的敏感内容。当时苏联惟一的研究苏德关系的专著,是 И. Ф. 马克西梅切夫所著的《和平外交反对战争外交——1933—1939 年苏德外交关系概要》,书中写道:“尽管在(谈判的)第一阶段还未涉及即将来临的战争,然而直到最后,它(苏联)的确还想缔结能有利于击退侵略者进攻的平等有效的联盟……由于西方竭力不让反侵略联盟得以实现,所以苏联只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因不可避免的决定性冲突所造成的最初有利地位的范围内与纳粹达成协议,因为欧洲的命运、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结局”。^②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苏联官方开始改变对 1939 年苏德条约的态度。1989 年底,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的,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领导下的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政治和法律评价委员会,首次正式承认秘密议

① 加布里埃尔·戈罗杰茨基:《苏德条约的内幕》(Gabriel. Gorodetsky, “Les dessous du pacte germano-sovietique”),法国《外交世界》月报(*La monde diplomatique*) 1997 年第 7 期,第 23 页。

② И. Ф. 马克西梅切夫:《和平外交反对战争外交,1933—1939 年苏德外交关系概要》,(И. Ф. Максимычев. Дипломатия мира против дипломатия войны. Очерк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33 - 1939 годах. М., 1981.),莫斯科 1981 年版。

定书的存在,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文件的基本内容。^① 依据 1989 年 12 月 24 日苏联第二届人代会通过的特别决议:“1939 年 8 月 23 日的议定书以及 1939—1941 年间(苏联)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议定书,不仅在缔约的方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背离了苏联外交的列宁主义原则。依据法律观念,苏德在这些协定中划分势力范围和其他一些行为,损害了许多第三国的主权和独立”,所有的苏德秘密协议被确认为“自签字时起就没有法律依据,并且是无效的”。^② 1990 年,苏联出版了苏联外交文件集《危机的年代(1938—1939)文件与资料选编》,其中首次公布这一时期有关苏德交往的文件,其中就包括苏德条约的秘密议定书。^③

自从冷战结束后,大量的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苏德战争以前的两国关系的档案文献源源不断地公布和发表。俄罗斯学术界对苏德关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俄罗斯学者突破原先思想的禁锢,开始对苏德关系史进行全新的探讨。俄罗斯学者在档案材料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他们根据新解密的材料撰写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

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强调苏联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伏拉耶夫认为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苏联武装力量遭到削弱,由此影响了苏联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清洗给苏联在西方造成消极的影响,增加英国、法国、美国对苏联以及它的对外政策和抵抗侵略能力的怀疑。他进一步断定,这是苏联与西方谈判破裂和斯大林转向同德国建立

① 苏联《真理报》,1989 年 12 月 24 日。

② 苏联《真理报》,1989 年 12 月 28 日。

③ 苏联外交部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文件与资料选编》第 2 卷(Год кризиса 1938 - 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Москва 1990.),莫斯科 1990 年版,第 321 页。

密切关系的缘由。^① 第二种观点接近于前苏联的正统观点,即苏联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主要出于确保自身安全的权宜之计。B. Я. 西波尔斯认为,德国是苏德接近的倡导者,有证据表明,万一德国进攻波兰后致使波兰的毁灭不可避免,从而将把德国国防军带到苏联边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与西方强国的谈判失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才和德国达成协议。^② 第三种观点侧重于苏联外交的意识形态方面,认为斯大林寻求同德国结盟是出于实现世界革命的动机。根据拉津斯基对此的诠释,斯大林预料,希特勒把欧洲拖入了战争,并已开始摧毁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已不是主观幻想。现实的世界革命已临近欧洲……只需要推动,不断地推动希特勒。^③ 第四种观点注重历史的延续性,认为苏德友好关系起始于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苏德关系建立了对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关系。两国关系的基础是共同对压制它们的凡尔赛体系的仇恨。按照A. A. 普罗宁的看法,“1939年的苏德协定是建筑在多年准备的基础上的”,在1939年,苏联和德国“在两国关系方面重新奉行以前的友好政策,这种政策完全依靠相似的利益基础:彼此对波兰和凡尔赛(条约)的不满”。^④ 还有一种观点则强调政治和经

-
- ① В. К. 伏拉耶夫:《关于国际关系和苏联外交政策的研究》,(В. К. Фурсев. Об Изуч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载俄罗斯《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2年第3期,第14页。
- ② В. Я. 西波尔斯:《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外交秘密(1939—1941年)》(В. Я. Сиполс. Тайны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канун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Москва 1997.),莫斯科1997年版,第182—183页。
- ③ 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504页。
- ④ А. А. 普罗宁:《1939年苏德条约:起源和影响》,(А. А. Пронин, “Совеско герман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1939 г.: Истоки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载俄罗斯《国际史杂志》(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2000年第10期。